目　录

沧桑录

我和中国托派相处的日子（之二）……斯施云（1）

征兵专题

解放前湘乡征兵史话……潘云（39）

人物春秋

王基永的一生……周五强（47）
抗日阵亡将领彭璋……朱炳衡（54）
李炎光生平……刘崇仁（58）
湘乡解放前夕的县长张梅荪……张公度　唐诗戡（61）
为抗日捐躯的章庆先……廖奇丛（65）
回忆北伐战争中阵亡的廖新赓团长……杨述田（67）
肖三的父亲肖岳英先生
……肖昆　杨厚光　王政明（70）
湘乡武林高手张九法师
……张继隆　李若虞供稿　潘云整理（73）
田稷丰其人……王器瑚（75）

教育卫生

抗日战争时期的湘乡中学……宋光虎（7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攸叙女校与潘小鲁先生办学事迹……龚叔纯（81）
我的母校楚瑞中学……彭剑平（85）
回忆南城小学……童起予（87）
湘乡近代艺苑杂忆……陈松年（91）
解放初期的湘乡县人民医院……刘秉勋（94）

工商经济

清末民初湘乡的钱庄和典当业……周旭才（97）
廖祜初办矿……廖佛山　廖奇丛（103）
抗日战争时期湘乡食盐官销情况……陈忠华（106）
湘乡国药业同仁忆旧……朱金南　成荫堂
　孙元昌　周振　程枚先口述　葛顺荣整理（108）
大同福酒作酱园史话……胡晶秋口述　葛顺荣整理（111）
我在湘乡直接税局的经历……杨绽青（113）

斗争风云

大革命时期一区五乡农民协会记略……龚叔纯（115）
我在农村戏剧宣传队的日子里……成诗骏（118）
在虞塘阻击蒋军战车纪实……钟景行（120）
我参加农民革命自卫队的简况
……彭仲藩口述　周旭才整理（122）

历史点滴

解放前的湘乡孤儿所……谢楠才（125）
湘乡留班会活动始末……肖雨生（129）

郑达在湘乡县政府的特种会报室……段移山（134）
解放前兴仁乡的一次党团摩擦
……杨定时口述　杨绽青整理（136）
我所亲历的一场官司……廖奇丛（139）
解放前洪塘地区的租佃……康炳勤（142）
民国时期的特大旱年……贺远其（144）
远征印度缅甸见闻点滴……杨述田（146）

民情风俗

传统节日习俗漫谈……周喜华（150）

我和中国托派相处的日子 （之二）

——中国托派的早期活动在上海——

斯施云

作者说明： 本文(之一)《归国》，在《湘乡文史资料》第三辑刊出以后，有人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该文首段末尾，我向读者交代全文要写的是“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归国情况”，可是为什么写到“小心翼翼地跨进了祖国的大门”就刹车了？二是《湘乡文史资料》每年只刊出一期，而我作为个人回忆录来写，逐年写上(之一)(之二)，究竟要到哪一年才能写完？说我已年迈苍苍，对本文的“完稿”有无全盘的考虑？

谢谢读者的关心，本文（之一）的小标题原为《从莫斯科到上海》，时因老伴新丧，心力交瘁，正如该文注释（10）中所说，除苏俄边境线内造化之神对我深怀恶意的种种折磨省略不写，就连跨进祖国大门后抵达上海的情况也中止了。因此，我把小标题改为《归国》，但却没有来得及同时把首段末尾“回到上海的”那几个字删去了。至于我每篇用（之一）、（之二）来写，在大题目的统率下标上了小标题，就可合可分，保持了每篇相对的独立性。说到“完稿”的打算，我想在这篇大题目的统率下除这里的（之二），还写两篇：（之三）的小标题是《从“广西王公度托派案”所想到的》；（之四）的

小标题是《反思与探索》，以期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对托派问题提高到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行一次再认识，通过认真的反思与探索，得出一个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结论。当然这在目前只是我的主观愿望，万一象曾一度自命为中国托派领袖的刘仁静那样一旦在街头死于非命，或有其他使我无法动笔的意外，这就另当别论了。

*　　*　　*

几经折磨越过中俄双方边防军严守的警戒线，跨进了祖国的大门，我心头不免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曾记得两年前，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和对被称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祖国苏联的无比仰慕，从上海偷偷地登上去海参崴的货轮，向红色首都莫斯科进发的时候，我坚信无疑地把苏联看作为我们工人阶级的天堂。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我在归国的途中竟要遭受到如此的磨难。其实，苏联一直不是、还远远不是一个什么工人阶级的天堂。回想当时，我那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一入国境线，我们这支带路人拥有绝对权威的小队，就无形散开各奔前程了。我和老葛裹着辘辘饥肠到小饭馆饱餐一顿以后，就同奔绥芬河车站去接取行李，准备向关内继续进发。途中老葛以严肃的神态问我在行李包里面夹带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这时我毫不介意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值钱的，只有一张“团证”夹藏在包里。他听我这么一说，突然停止脚步，轻声责怪我“你太轻率了，万一这东西被边关检查哨发现，你我此去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我们决不能一进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就去冒这种风险。为安全计，只有把这个包袱一心抛弃算了！”说着，我就只好跟随他默默回到原先投宿的旅店，计较下一步的打算。

当晚在旅店里，我把我在旅行袋里夹带团员证归国的想法告诉了老葛：我认为自己在中大时组织上并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今后回上海，我仍可通过熟识的人找组织接上关系。他听了直率地嗤笑我太天真了，并说正因为我太天真，所以他至今还没有把在海参崴老王早已告知的回国接头地点告诉我。他还告诉我说，他原想跟我同路乘车去天津的，现在，看情况为我俩沿途各自的安全计，明天只能分手各自单独启程了，他说将去天津商业学校，找贝云峰接头。要我后走一步，我若经天津可到商业学校通过贝云峰去找他，如我去上海就可去北四川路新宇宙书店找张致良，他会接待的……。我听了他的话又喜又忧：喜的是此去上海算有了个落脚点，但是我终究还是个刚成年的大孩子，独自一人远去上海，不免心里有些忧虑。他见我收敛起笑容默默地呆着，便又把此去上海的路线和沿途应注意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表示，如路费欠缺，他可予以适当的支援。我听了随手摸了摸里衣的口袋，谢绝了他的好意，并壮壮胆向他表示一定听他的话，克服路途中的种种困难，请他放心。一宵过去，凌晨，他便离我而去，而我也在当天起程从绥芬河经哈尔滨、长春、沈阳，直到天津转塘沽搭海轮，于1929年初回到了上海。

在归途中，我虽尽量小心，终究由于我年轻幼稚，还是遭受了几乎沦为沿途乞食的流浪儿的命运：我从绥芬河抵达沈阳的当晚，在投宿的旅店中，深夜遭到同房一个扒窃的暗算，我所带的盘费全部被窃。当时我没带什么行李，一个光

人和许多陌生的旅客睡在一个大炕上。为审慎计，我把藏有盘费的棉衣当作枕垫通晚用脑袋守护着。谁知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摸摸口袋，皮包竟已不翼而飞！为了筹措去上海的旅费，我于被盗的当天，就去叩苏俄驻沈阳大使馆的门，凭着我能说一口可以应付的俄语，总算得到了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使馆成员的接见，我当即向他透露了莫斯科中大二届毕业学生和共青团员的身份，为了确切地证实自己的身份，连中大学生证的号码也告诉了他，随之便向他申述昨夜在旅店失窃，去上海的旅费无着请予资助的要求。他听后答应予以考虑，要我次日上午去听候消息。我基于下述的考虑，对他明上午的答复是充满希望的：我当时认为莫斯科把我们跟国民党右派一同遣送归国，是因为把我们看作跟他们同样为反共分子的缘故。而现在我们以私下转道易从边境归国的实际行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而且在全国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向他暴露了；如果苏俄领事馆人员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对我此种出于无奈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谁知我第二天上午一去却吃了闭门羹，竟再也不予接见了。后来回上海跟人谈起这件事，他们跟老葛把我想通过携带团员证回国找关系的事一样，又说我“太天真了”。

正当我在苏俄领事馆吃了闭门羹回旅店踌躇莫展的时候，同房来了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知识青年，我和他很快就攀谈上了。我见他带有一本鲁迅的《呐喊》在看，就跟他从鲁迅、郭沫若谈到了上海的“左联”、“创造社”……在攀谈中，我已认定他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中国三十年代左倾的进步青年时，便把自己模拟为一个受封建家庭所压制而出走的失学青年，今去天津投亲求援以谋求继续升学，并申述由于

昨晚在旅店失窃目下一时无法登程的苦难。不料想这位好心人，听后即便慷慨解囊相助，不足之数竟将一床高级毛毯入当，凑足了我去天津的旅费。这位好人我当时虽留下了他的姓名地址，但我到上海后，生活一直穷困潦倒，无法偿还他这笔帐。当然，每忆往事，至今数十年我都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这个三十年代左倾先进青年的形象。

我一到天津，就按老葛临别时告诉我的地址，费了牛大的力气去找商业学校贝云峰。谁知天不如人愿，学校找到了而门房说这学校没有贝云峰其人。事到如今，出于无奈，我只得把中大一位挚友临别相赠的珍贵礼物——一个金戒子送往首饰店兑取现金，而那个金铺的老板象个杀牛的屠户，偏偏要当着我的面故作姿态，一手交钱，一手把完整的戒指扭曲得瘪瘪的，真使人感到痛心！就这样，我在归国的途中几乎沦为乞丐的苦难之中，借助于此种难忘的情谊，终于从天津到塘沽搭海轮于1929年初抵达上海。

*　　*　　*

上海，这是我经受过两年多党报印刷发行地下工作磨炼的地方，特别是北四川路我并不陌生，那里有鲁迅常住的寓所，有较进步的日本"内山书店"，有左翼作家的枢纽"创造社"，路的终点，还有便于地下工作者进行活动的好地方——虹口公园。于是船一靠码头，我便一直按老葛所说的，直奔北四川路，在横浜桥附近找到了新宇宙书店。这店铺面不大，书架上经售一些比较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新文艺作品。只见帐台上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书柜侧面有一个学徒模样的小伙子在照料顾客，我从他口里探知，那个帐

台上的年轻人就是张致良，于是我就走过去大胆的跟他攀谈上了。我向他介绍自己是被远方的朋友介绍来见他的。看来，他一听我这样说，便知道我的来历了。于是他和我握住手，说声“辛苦了”以后，两人会心地一笑，就热情地把我带到了附近虬江路虬江里，找到了先我一步从莫斯科遣回的中大第二届毕业第二批归国的托派学生张元符①等，并跟他们接上了关系。

新宇宙书店②是湖北一个姓张的破落地主来上海设开的。张致良是他的侄子，有一定的文化和思想水平，是这个店的经理、会计兼编辑。这个书店和中国托派的关系开始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当时，从莫斯科中大遣送归国的第一批托派学生，首次和这书店取得联系；现在，我们第二批回国，又借助它和第一批学生接上了关系。第一批归国的陆一远③回到上海靠翻译卖稿过日，而结婚不久，生活开支大，所以他的经济收入依靠书店，而书店在审稿、编辑、出版等方面也需要他，因此，他同张致良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正因为陆一远对张致良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使张成为我们的同路人，随之这个书店也就成了中国托派在上海早期活动的第一个落脚点，它既是我们在上海活动的枢纽，又是我们与国内外取得通讯联系的中转站。由此也可想见，陆一远归国后跟莫斯科中大潜在的中国托派学生的联系了，我们此次归国经海参崴与老葛接上关系的黄中美，不就是和陆同一届的同学，而且同是浙江人吗？解放后，李维汉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工作时，之所以说北四川路新宇宙书店是正统托派的“大本营”，是不无道理的了。

在我们归国以前，第一批莫斯科中大归国的托派学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除陆一远③外，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因为参加了苏俄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反斯大林的游行示威被开除党团组织后提前遣送归国的。当我们第二批归国时，他们已散驻全国各地开展了托派的宣传组织活动达一年之久。据我所知，在北京天津的有宋逢春④、肖祥彬、贝云峰、董汝诚，还有在北京早已在党内工作的罗汉；在港粤地区主要有梁干乔⑤、陈逸谋、区就尧（即区芳）⑥，在上海的主要有陆一远。

第一批比我们早回一年多的中国托派学生，他们活动的详细情况我不大清楚。只知在北方的宋逢春等由于出国前在京津地区搞过学运，原有适当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大中学校中开展了一定的活动。在南方，由于梁干乔出国前跟彭湃同志一起搞过农运，陈逸谋和区芳跟港粤地区的海运和船坞的工人有联系，所以他们在工农群众中开展了活动，听说他们在工人中已建立起学习小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上海，陆一远除通过张致良以及新宇宙书店建立了中国托派早期活动的枢纽以外，还利用同乡的关系，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⑦的职工中开展了活动。记得图书馆的宋景秀和一个姓刘的，经过陆的工作，思想上打下了托洛茨基主义较深的烙印。当时他俩与陆一远共同商定了一个在上海广泛开展托派理论宣传活动的打算，就是以东方图书馆的名义成立一个附属的机构——“流通图书馆”，利用这一机构，在向各地读者邮寄借阅图书的同时，将托派的宣传资料寄发出去，在社会各阶层中扩大托派的政治影响。但我不知他们这个计划具体进行的情况。此外，陆一远后来还曾任上海艺大社会系主任，协助区芳在校开展托

派活动。

综上所述，中国托派在上海最早开展活动的人要算是陆一远了。

当我们第二批归国学生到达上海时，区芳已由港粤地区转移到上海来了。当时听说他已在法租界上海艺术大学任教，通过他的活动，对艺大的学生思想影响不小，似乎在学生中已成立有学习小组了。

第二批从莫斯科中大归国的托派学生中，比我先走一步到上海的，几乎都通过新宇宙书店由张致良接上关系，当时都住在闸北虬江路虬江里，一栋石库门房子的后楼，他们是张师、徐正庵、张元符、傅仁麟等。这些人除傅仁麟与我同班已知他的政治面貌以外，其余的人我在莫斯科并不知道他们是托派学生。这些人大概都和我一样，在中大不是引人注目而进行公开活动的积极分子，所以只不予介绍组织关系都不作任何处理被遣送归国的。（在国内出版的几种史料刊物上，有人把这第二批归国的托派学生包括我在内误认为和上面第一批归国的一样，都曾于1927年参加过莫斯科红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反斯大林的游行示威活动的，而且在记述归国的时间上也随之与事实不符。）当时，我们挤着住在一起，由于生活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为了饱肚子各人的流动性很大，经常相处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比较稳定常住在这里的只有张元符、傅仁麟和我三个人。正如鲁迅所说大凡人生有三个阶段：一是“生存”，二是“温饱”，三是“发展”。所以这时候，我们即使大家碰在一起，少不了各人都自命为托洛茨基的信奉者，但似乎“政治热情”也不那么高，很少提起政治问题。更不要说如何致力于在中国开展

托派活动了。

为了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徐正庵和张师二人只好“打游击”：我则利用在上海的老关系，找到了以前在上海党的地下印刷所的总负责人倪忧天，他这时已独自在闸北天通庵路开办了一个私人印刷所，我带着傅仁麟到他的印刷厂里当了临时工，暂时解决吃饭问题。这时张元符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就常驻虬江里蹲点与新宇宙书店张致良经常保持联系，设法与莫斯科中大的秘密托派组织和国内南北各地进行活动的第一批归国的托派学生取得联系。由于区芳是从港粤地区转来上海的，熟悉那边的情况，就由他协助张元符共同负责建立通讯联系，在北方似乎当时还没有接上关系。

为了谋求生活有个来源，我们就和新宇宙书店张致良协商，把由莫斯科中大带回的讲义《西方革命史》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交由新宇宙书店出版，不要求一次付给稿费，但必须按月定期供给我们必需的生活用费。在我们和新宇宙书店的这个协议建立以后，双方的接触也随之更频繁了。这时，张致良向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为双方的安全计，要我们指定一个专人负责与该店接触交往，办理有关通讯联络事宜。经我们协商，同意了他的意见，并鉴于我年轻在上海又有两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工作环境的适应力较强，就推定我担负起这一工作。后来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张致良时，他对我这位刚成年的小伙计，表示欢迎以外，还善意地向我提出了一个意见，要我从此更易一个假名来从事这一工作。我随即同意了这个宝贵的建议，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叫“史唐”。从此中国托派在上海的早期活动也就紧随陆一远踏出的第一步，继续开拓了新的前景。

约在1929年三月间，我们相互约定在陆一远家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共同商讨了我们今后如何开展托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问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一、初步建立联络国内外同志的通讯网，并推定专人负责：由陆一远与莫斯科中大托派学生的秘密组织联系，由区芳与活动在港粤的托派学生联系；二、在与外地联系时，征求对方的意见，以便确定并安排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在上海召开一次有全国代表性的会议；三、决定暂以虬江路虬江里的住所为联络站，并推定由张元符常驻负总责，以新宇宙书店为传递与接应讯息的枢纽，就由我负责。

通过上述的活动，一个月以后，在1929年四月，我们在上海召开了由港粤地区和上海的托派成员参加的可说是中国托派的第一次有代表性的会议⑧。这次会议参加的成员除从莫斯科中大归国的第一二批托派学生陆一远、梁干乔、陈逸谋、区芳、张元符、傅仁麟、徐亚庵、张师和我以外，还有港粤地区的工人代表张九和×××，以及上海东方图书馆的宋景修和×××。共十三人。（见⑧）

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决定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出一个宣传托派理论和政治主张的刊物，并定名为《我们的话》⑨。二是推定梁干乔、张元符和我为会后出刊和组织联络工作的总负责人，（组成总干事会，分工是我为主席、梁搞组织、张搞宣传）并指定陆一远负责协助搞国内外的联络工作，区芳负责协助搞宣传出刊工作。这次会议还没有谈及什么“组织条例”或“政治纲领”（见⑧），会后也未留下书面纪录或决议案。当然，这是由于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仍是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成员，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路线与战略问题上与斯大林及实际上由联共中央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有原则性的分歧而被排挤出组织而已，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只是"党内"的"派"，历来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而从来不承认是"党外"的党。也正因为这样，以后由莫斯科归国的第三批托派学生出现新的组合的时候，也都和我们一样，总是在他们各自出版的宣传刊物的名称后面加上一个"社"字或"集团"来称呼他们的每一个"派"的⑩。

会后，港粤地区参加会议的四个人：梁干乔留在上海作为总负责人之一，其余三人回原地区继续开展活动，他们当地的工作以及与上海的联络由陈逸谋负责。

会后不久，《我们的话》的第一期（油印件）就和读者见面了。我原是印刷工人，但对油印却是外行，张特（即张元符）也没有经验，加之为经济条件所限，这个刊物的质量很不理想。当时这一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是陆一远、区芳、张师、张特，我也动笔用俄文名字（Э Лиаба）的译名安力华写过一篇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文章。最初几期这一刊物上的文章，其主要论点大体为：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苏共中央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路线政策的错误所造成的，把这一重大责任全推在中共中央陈独秀的身上，把陈独秀拿来作为斯大林的替罪羊是极不光彩的；二、介绍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后，苏共中央当权的斯大林在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推行的错误路线与政策，以及苏共中央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为主所提出的反对派意见，并通过对比，从一定理论高度上，批评了斯大林的"三段革命论"，宣扬了托洛茨

基的“不断革命论”；三、结合1928年前后在联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耳闻目睹的事实，站在托派的立场上，揭发斯大林违背党性原则专横跋扈、残酷压制反对派、排除异己的情况；四、对当时全国特别是上海严重制造白色恐怖，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动统治者的揭露和鞭挞；五、对当时执行国际路线的党中央盲动主义的批评。

说实话，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归国的第一二批托派学生，在莫斯科各学校里所接触到的托洛茨基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迪克等所撰写的文件，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出笼的，至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上，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著述，大家心里谁都没有底，更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加之，托洛茨基被开除流放异地以后，虽从未放弃过他用书面发表政见的权利和丧失过他的著述在苏联境内乃至国外传播散发的机遇，但作为我们已经归国的中国托派要不失时机地获得他所撰述的文件，在时间上，究竟比苏联国内的反对派要困难得多。事实上，被人称为中国托派（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思想武器和纲领性的托茨洛基撰述的那三篇文章⑪，是从莫斯科中大托派学生的秘密组织译寄以及以后归国的第三批托派学生携带回国的。也正因为这样，当时《我们的话》的这些撰稿人包括负责编审出刊的人在内，他们笔下不免出现分歧或与托洛茨基本人的原意不符甚或错误之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也正因为这样，后来在中国第三批托派学生从莫斯科带回托洛茨基的这三篇在世界各国的托派中最有权威性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述以后，有心人阅读以后与《我们的话》前一段所刊出的

文章，一对就提出了不能不令人信服的批评。且看“无产者”的领导人之一郑超麟⑫所说的：“1928年底，1929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而且我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其他的人也许有别的不满意，而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形势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潮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⑬当然，这也同时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时党内的所谓陈独秀派包括陈独秀本人，并不是出于派性的政治偏见，就一下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的。正如郑超麟自己所说：“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他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就不提上次不同的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直到他完全接受为止”⑭。就这样，他们对我们编印散发的《我们的话》及其他的托派文件不断学习反复讨论，然后，才在他们的思想上深浅不一，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的，而且进一步从理论到行动，很快为争取在党内贯彻这个主张采取了各种措施，付诸他们的斗争实践。这主要表现

在：

首先，以陈独秀的名义，于1929年8月5日，融会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精神，向党中央写信，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任务、性质和策略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与中共“六大”根本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中央把他们的这封信，向全党公布交由基层组织民主讨论。在这封信的意见遭到拒绝后，他们将这封信自行印发，还包括中东路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于10月10日，10月26日（与彭述之联名）连续写信向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意见。1929年11月15日，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议以后，陈又于同年12月10日及15日先后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仍执意坚持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这些书信成为当时他们在党内扩大政治影响的思想武器，也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研究和分析陈独秀转向托派的历史文献。

其次，陈独秀等人从组织上进一步设法与我们取得联系，希望共同协商建立统一组织。约在1929年8月下旬，他们派尹宽为代表通过新宇宙书店向我们提出共同协商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并约定时间，邀我们派人去法国公园与之晤谈。我持信跟张特、梁干乔共商对策时，梁发出浮轻的微笑，似乎对此不感兴趣，我和张特的意见认为应如约前去晤谈，且看他们的意图如何再作计较。结果推我如约前去跟尹宽晤谈。尹宽是一位瘦瘦的高个子，安徽口音，态度和蔼可亲，是一位在长期地下工作中锻炼成长的老干部。现在作为我久已敬仰的陈独秀的代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十分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